



明代福建文学结聚 与文化研究

下

A Study on Literary Clusters and Culture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郑礼炬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明代福建文学结聚 与文化研究

下

A Study on Literary Clusters and Culture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郑礼炬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 编

正德至万历间福建心学传播研究

——以文化与文学家族为考察中心

导语

通览自周代以来 3000 余年的中国史，福建与中原相隔遥远，“闽在上世，不列于职方”^①，僻在海隅。直至明清时期，福建的士大夫仍谦称自己来自海滨陬邑^②。地域上的空间距离，使得福建与建都于北方的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城市的历代中央政府产生心理和文化上的距离感，福建也被北方士大夫视为天涯方外之地。福建士人既来自遥远地方，南宋之前，北方地区，甚至临近的江西学者和作家，对待福建的人才、文化和文学成就基本持鄙视态度。这种态度有失公允，往往先入为主，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到来之前漫长历史进程中对福建文化和文学应有的价值判断。

两晋之间的永嘉衣冠南渡，北方林、陈、黄、郑、胡、何、丘、詹八大姓士族避难来到福建，基本上聚居于今福建北部乃至福州市、莆田市一带，远及泉州市。今泉州以北，多有地名、建筑为纪念中原故土及永嘉南渡而命名者，如晋安、晋江冠之以“晋”，而漳州仍未接受大量移民，直到陈元光入闽，“奏得援兵五十八姓”^③入闽，逐渐带动了漳州以及今广东潮州一带的开发。

按照明代福建大学士叶向高的说法，唐代常衮（729—785）在福建（780—785）提倡学校之后，“衣冠始奋”^④，这是福建文化勃兴的开端。今晋江市潘湖欧厝人欧阳詹（755—800）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以第二名举进士，与韩愈同榜，名动天下。明人蔡清在为欧阳詹文集作序时，盛称欧阳詹对于福建的影响。其《书欧阳行周先生文集序》：“自是闽士始知所向慕，儒风日以振起，相师不绝迤逦，至于杨龟山（时）、李延平（侗）辈分河洛之

① 叶向高《闽书序》，何乔远《闽书》卷首，第 5 页。此序撰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

② 如康大和撰《万历甲戌志序》：“兴郡僻处遐陬，自职方视之，一蕞尔之区耳，然山川灵秀，萃为隽英，鸿儒巨卿后先辈出，遂称名邦。”（廖必琦等《兴化府莆田县志》卷首，第 8 页）兴化府（今莆田市）为处遐陬之“蕞尔之区”，福建在全国的地理位置何尝不类似。

③ 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一，陈元光本传，第 1012 页。

④ 叶向高《闽书序》，《闽书》卷首，第 5 页。

派，授之朱子，而正学大明，道统有归，吾闽遂称‘海滨邹鲁’矣，是正有类夫瓜瓞之势，其蔓不绝，至末而益大者，谓非先生实为之根柢又不可也。”^①

北宋以来，福建的士大夫逐渐以后发的优势，引领全国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风气。“至宋，而龟山先生（按：指杨时）得统河洛，诸大儒接踵继起，焕乎揭日月于中天，幽遐奥渫，悉耀光明，邹鲁之名，繇此而著。明兴，益绪其业，山陬海澨弦诵相闻，硕士魁人后先继起。……要以渊源所自，实本宋儒。故宋儒之功，于闽不啻辟鸿蒙而开天。……天地淳龐之气，及久而发，则必发其昌”^②。北宋末年，南剑州将乐人杨时（1044—1130）、建州建阳人游酢（1053—1123）北学中原，把中原当时最先进的理学带回福建，使得二程兄弟的理学“吾道南矣”^③，以闽北的建州（明建宁府，今属南平市，包括今建瓯、建阳、武夷山等地）、南剑州（明延平府，今属南平市）和闽西北的邵武军（明邵武府，今属南平市）为中心，渐次向福建沿海、南部传播。南宋的朱熹一生仕宦不达，常在福建，以今南平市辖下的武夷山、建阳为生活和学术活动的中心，讲学授徒，笺注儒家典籍，阐发儒家奥义，集宋代大儒的成就，而在其身后，朱熹的学术思想更得到南宋理宗皇帝的提倡，其学术从“伪学”一跃而为显学，风靡天下，代表了南宋以来历朝历代朝廷对统治思想的明确选择。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使朱熹成为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对福建学术的发展起到最有力的推动，福建因此成为南宋以来程朱理学研究和传播的重镇。进入明朝，朝廷钦定科举使用程朱为主的儒家经典及其阐释著作，排斥子史百家和儒家其他学者的思想。《明史·儒林传》：“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④所谓排斥邪说，定于程朱一尊的科举局面很长时间没有改变，如同一汪不起波澜的死水，直到万历以后方才发生渐变，间用心学和禅学入制艺时文^⑤，所以朱熹的学术对明代士人的影响

① 蔡清《虚斋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今福建漳州市东山县东门屿岛上黄道周云山石室故址有“海滨邹鲁”石刻。

② 叶向高《闽书序》，《闽书》卷首，第5—6页。

③ 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杨时传》，第12738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杨时的籍贯根据《宋史》本传，一说杨时明溪人。按：明溪，明代成化六年（1470）置县。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二，第24册，第7222页。

⑤ 程朱学说故为士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据相关文献，在制艺中敢于羼入心学思想的情形出现在万历五年丁丑（1577）杨起元会试卷中，而学术思想的异变则在陈献章、王守仁等学者身上，《明史·儒林传》：“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卷二百八十二，第7222页）

由于明代科举的作用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是朱熹生前难以想象的趋势。

清代纂修的《乌石山志》卷四“先贤石室”(按:即南宋朱熹的“石室清隐”)条下引康熙间提学孙期昌所撰《建复朱夫子石室清隐斋记》:“闽之州在岭之南,去鲁壁远甚,闻其俗家弦而户诵,士之砥行修业者,视他州较著。何也?盖天生哲人,将以大斯道之传,其理学固不独闽人宜景芳型也,而闽学则自文公朱夫子始绍其统。按公家谱,徽人也,系出新安。尊人韦斋先生,讳松,为尤溪尉,侨寓于闽,阐濂洛之奥,日以讲学为事,疾革时嘱公曰:‘刘白水、刘屏山、胡籍溪,学有渊源,吾所敬畏,盍往事之?’公遵先训,从三君子及李延平游,其学大都穷理以致知,反躬以力行而以居敬为主。登第五十年,仕于外九年,立朝侃侃仅四十日,多所建白,有忌公者,目为伪学,盖行道若斯之难也。进不见用,故退居山林之日恒多。性喜登陟,凡闽之悬崖绝壑,经公凭览,直视之以为拱卫鲁壁云尔。晚乃卜居建阳之考亭,自号曰紫阳。当公闭户著书,其作《纲目》也,一本《春秋》书爵书人之旨。其作传注也,表章圣经,发明理学,直接千古圣贤之统。昔黄勉斋(按:黄榦,朱熹门人,学者称勉斋先生)先生尝曰:‘孔孟以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朱夫子而始著。’由斯观之,公殆汉、唐、宋以来理学一人而已。理宗朝赠太师,追封徽国公。明太祖崇重儒术,诸不在孔子之科者绝使无进,独以公《四书五经集注》颁置学宫,天下翕然宗之,爱谥曰文崇,祀孔子庙,俎之豆之,未有艾也。福州旧有‘石室清隐’遗迹,字镌石上。兵燹之余,混为民居。康熙四年,督学使者陆君讳求可,别立祠于道山之麓,鸠工庀材。事方告竣,未及勒碑,而轺车遄发,回视‘石室清隐’,不无遗憾焉。丁巳夏,余膺简命,校士兹土,亦忝有师表之责,猥思阐扬至训,明绝学,以为多士倡。甫下车,谒公庙,拜瞻其像,能无想见其心欤?乃特祀盛典阙焉无纪,谁之咎也?于是旁稽博采,考夫子之旧,捐赎石室而复之,堂庑几筵,无所增设,志其旧也。圾砖扁额丹艤有加,昭其文也。后之学者,入其门,履其庭,凛然知所敬畏,恍如‘正心诚意’四字铭,襟带如昨。然则是祠也,闽士子其犹睹鲁之官墙而兴起也。夫铭曰:‘哲人不作,吾道欲南。继兹孔孟,分一为三。士瞻面貌,如对鸡坛。馨流俎豆,不数石函。贞珉载德,风雨需探。’”^①这篇斋记以仰视的视角赞颂朱熹在儒家道统中的作用,层次清晰地记叙了朱熹的籍贯、师承、仕宦、著述的情形,借其门人、子婿黄榦之口,许为汉、唐、宋以来“理学一人”,探究了朱熹对福建学术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作用,解答了福建士子

^① 郭柏苍《乌石山志》卷四。

“家弦户诵”、“砥行修业”的原因。

朱熹的学术通过他在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门人逐渐传播到全国。元代南北统一以后，传播到江淮以北。明兴三十余载，号称“明初理学之冠”的渑池人曹端倡明绝学^①，籍贯河津的薛瑄被推重为明代第一醇儒^②，“学一本程朱”，尝言“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③。元代贡师泰所撰的《勉斋书院记》，以朱熹高弟黄榦为例典型地描述朱熹学说在南宋的传播。《记》曰：“至正十九年冬十月，福州始作勉斋书院，明年秋八月告成。丁亥，廉访使率郡大夫士行释奠礼。己丑，经略使李君国凤谒祠下，用便宜署今额，以儒人张理为山长，执事者间具本末，请记于贡师泰。曰：书院遍天下，而闽中为盛，大约祀徽国朱文公师弟子居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龙溪、双峰、北山之属皆是也。勉斋先生实文公高弟，独无专祠，顾非莅政者之缺欤？……师泰荒陋，何足以知此，然窃闻之斯道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所以为治，孔子、颜氏、曾子、子思、孟轲氏之所以为教，不幸而变于管、商，惨于申、韩，杂于荀、杨，暴于鞅、斯，磔裂破碎于毛、郑、贾、马、王、范之徒。幸而唐之韩愈氏能以所得著之《原道》之书，然其于性也主三品，于仁也专博爱，则犹未免于不详不精之失焉。至宋全盛，濂溪启其源，伊洛溯其流，渡江再世，文公始集诸儒之大成，使千载不传之道，复明于天下后世。吁，盛矣哉！于时门人弟子聪明卓越固不为少，然求其始终不渝、老而弥笃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因刘子澄一拜文公于屏山之后，即慨然以斯道自任。听风声于屋头，对孤灯于天曙，其坚志苦思为何如也！自是得执子婿之礼，从登庐阜，涉彭蠡，过洞庭，望九疑，宦游江、淮、湖、湘、吴、越、瓯、闽间，不惟口传心授于师门，愈久而愈博。而其所见名山大川，渊深高厚，皆有以助夫精微广大之学矣。是故征诸事业，则城安庆、御汉阳最为伟绩；著之方册，则《四书通释》、《仪礼通解》尤为有功，盖先生有志于斯文，以陆沉下官，不能大行其学，固可深慨。然圣贤坠绪非文公无以明，文公遗书非先生无以成，则斯文吾道，确乎其有所归矣。先生没，其传之著者：在闽则宓斋陈氏、信斋杨氏，在浙则北山何氏，江以西则临川黄氏，江以东则双峰饶氏。其久而益著者，则西山真氏《衍义》诸书，凡今经帷进讲、成均典教，皆出先生讲论之余也。呜呼，先生之道传之后世，

^① “明初理学之冠”语见《明史·儒林传》曹端本传（卷二百八十二，第7239页）。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薛文清集》提要，第1486页。原语：“明代醇儒，瑄为第一。”

^③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二，第7229页。

先王之书行乎天下，孰不想慕其高风，渐被其余泽，况鳌峰箕山之间，云烟苍莽，神气流行，慨然萧然，犹若有见乎其位，闻乎其音容者乎？书院之作，其有功于世教，岂曰小补之哉。”^①两宋及元代，福建的儒学蓬勃发展。据多洛肯的统计，在《宋元学案》中，“立案哲学家共九百八十人，其中福建籍有一百七十八人，是最多的，浙江一百五十七人，江西一百四十九人，四川一百四十二人，湖南一百四十一人，但都比不上福建。就《宋元学案》所立九十二个学案中，福建籍学者学案有十七个，几乎占五分之一，亦是全国各省之首”^②。这种学术优势延续到明代，从而对福建人的科举事业和文学、学术著述事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明代确立了以儒家五经取士的制度。林俊《小录前序》：“上古宪猷经运，率惟士焉，求道隆污，实系焉。战国任权略，西汉喜功名，东汉贵节义，乏通变，东晋乐恬旷，罕实用，士习固尔，宜世道之日趋以卑也。隋唐而降，词赋取士，无越无用之文。国朝按先臣朱熹之议，而折衷之经义，以端其本，论策以宣其用。学非是弗教，士非是弗习，主司非是弗取，朝廷非是弗以用。百五十年，士无不治之，经无不猎之。”^③皓首穷经，在明清两朝将近 600 年的历史中代复一代的士人身影叠加更增加了它的真实性，使得这个成语异常逼真，看不出一丝嘲讽的意味，在某些终生不售的读书人身上甚至体现出制度的残酷和威权的压迫。从明朝开始，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儒家经典进行学习、探究运动的黄金时代。以科举的名义，从上到下，全国各阶层都在自觉地发动周而复始的经典研习活动，因此明清两代也是学术史上最为自觉的普及儒家经典的时代。《明史·选举志二》：“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④乡试、会试取士时，以五经而分五房，各设房考官，考生可以专主一经以取功名。终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基本如此。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明代任

① 贡师泰《玩斋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多洛肯《明代福建进士研究》，第 27 页。

③ 林俊《见素集》卷六。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第 1693、1694 页。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多多少少都烙上了儒家经典的痕迹。

作为全国文化比较发达的福建，其科举成就在全国各直省中始终居于前列，得益于朝廷的取士制度，尤其注意的是福建士子在《易》的研习和考试中取得领先地位，但福建省内各府科举力量的分布不均衡，全省也仅仅是到了姚镆任福建提学副使时才具备了研习全部五经的格局。《闽书》姚镆本传：“自礼部郎出为广西提学佥事，转福建副使。……兴、泉寡通《春秋》，建、汀鲜《易》学，为延名经分教之，闽士通经始全。复讲求右礼，召诸生肄习。修闽中诸大儒书院，增其祀田，恤其后裔。”^①林俊之于姚镆多有往来，对姚镆在福建的政绩大加赞美。其《赠姚督学报政序》：“前成化间，邃翁（杨一清）在中书，士争出其门，无问可知为杨公弟子，及视学河北，而再视关西也，西北人材由杨公为盛；近弘治间，先生在礼部，亦踵杨公为烈，视学广右，而再视闽南也，东南人材亦由先生为盛，二公之大致同也，而精敏识治亦几颉颃无愧，邃翁之今日，先生之来日也。抑当时仅邃翁，今海内士不知有与先生齐名与否？代先生者，果亦值是人耶？又乌得不为闽士虑耶？岁之九月先生报政行，博士弟子者曰：‘吾闽文宗，由今一良遇姚先生，其不可借矣！’”^②

万历六年至八年（1578—1580），耿定向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原职巡抚福建地方。在福建任上，耿定向撰《福建乡试录序》：“窃闻诸缙绅学士谭者金曰‘闽海滨邹鲁’云。夫邹、鲁带甲之雄才不敌齐、楚，阨塞之险不逾秦、晋，谭者率称‘邹鲁’‘邹鲁’，则以孔孟之故矣。乃闽故南剽之裔疆也，周职方列诸荒服，而兹得与邹、鲁齿，何昉也。粤自杨中立氏（杨时）北学洛下，与闻孔孟之道，载之以南。嗣是，仲素（罗从彦）、愿中（李侗）承传，以及考亭（朱熹），益阐而恢张之，于是建溪、镡浦之间，述孔业者云蒸响臻，宛然断断之遗风矣，然诸儒实不逢世，维时谭者即欲跻闽于邹鲁，世不尽然也。”^③以地域远近为学术高下之分的标准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中士大夫和学者的共识，福建的学术、文化和人才在南宋之后蓬勃发展，明代福建以其极偏远、狭小之地不相称的极其强盛的人才队伍、极其繁荣的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成就，逐渐改变了世人对它的鄙夷态度和蔑视眼光。

① 何乔远《闽书》卷四十六，第1167页。

② 林俊《见素集》卷七。

③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序》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1册，影印第288页。

第七章 《明儒学案》福建心学人物辑考(上)

——嘉靖万历初心学人物

第一节 处于渐变中的明代闽学学者

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丘濬主考会试。其《会试策问》曰：“至若讲学明道，学者分内事也，近或大言阔视，以求独异于一世之人，程朱之学，果若是乎？……讲学明道者，有此实功，而不立此门户。不厌常而喜新，各矫偏而归正。”^①可见成化十一年(1475)之时，明朝在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转变传统程朱理学的、以陈献章和庄昶等学者为代表的学术新变^②，引起朝廷的重视和提防。

明代福建最早于学术思想上渐现心学思想某些要素的学者是福建漳州府布衣陈真晟。陈真晟(1411—1474)，字晦德，一字剩夫，镇海卫人。其祖先从泉州移戍镇海，落籍于镇海卫指挥使司。镇海卫城(在太武山南，明属漳浦县，去漳浦一百里，清雍正十二年改隶海澄县)在今龙海市隆教乡镇海

① 丘濬《重编琼台会稿》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按：成化年间，儒家体系学术思想固然出现了新变，正德、嘉靖间，王守仁的心学也逐渐传播开来了，但在科场中，成化以后直至万历初，士子基本上还是遵循朝廷制定的举业条格。最先引发这一变化的士大夫是杨起元。万历五年丁丑(1577)会试，罗汝芳的门人杨起元以禅入制艺并取得高第，催化了八股文内容的变化。顾炎武《日知录·举业》：“(艾南英云)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原其始？盖由一二聪明才辩之徒，厌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之说，乐简便而畏绳束。其端肇于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杨氏之书为最著。国初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盖至摘取良知之说，而士稍异学矣。然予观其书，不过师友讲论，立教明宗而已，未尝以人制举业也。龙溪之举业不传，阳明、绪山，班班可考矣。衡较其文，持论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异于朱氏之学者。然则今之为此者，谁为之始与？吾姑为隐去其姓名，而又详乙注其文，使学者知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俑者自斯人始。呜呼！降而为传灯，于彼教初说，其浅深相去已远矣。又况附会以援儒入墨之辈，其鄙陋可盛道哉？”(卷十八)

村，是明代著名的镇抚司，下辖“右、左、中、前、后五千户所”^①。镇海卫设有儒学，何乔远《闽书》漳州府《英旧志》“皇朝科第”于漳州府诸县外单列镇海卫的科第。陈真晟传见《闽书》卷一百三十、康熙《漳浦县志》卷十六、《明史》本传、同治刊本《福建通志》卷二百十二、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十等。

《闽中理学渊源考》立《布衣陈剩夫先生真晟学派》，李清馥按语：“陆清献公（陆陇其，1630—1692）《问学录》曰：‘（郑晓）《吾学编》以胡敬斋（胡居仁）、陈剩夫附于白沙之传，此其失莫甚焉！敬斋虽与白沙同游康斋之门，然其学固非白沙所及；陈剩夫著《程朱正学纂要》，虽其教人专一静坐，陈清澜（陈建）谓其学识未及胡敬斋，只是狷介之士，然亦非白沙禅学之比，而乃以附白沙之传，何哉？’按：此陆清献公卫道之严也。白沙虽与敬斋共学于康斋，实同门而异户；布衣先生其用功实从主一之训，入其学术，端默沉潜，持守有余，前辈杨氏廉以为和靖之徒，《明史》传谓其‘潜思静坐，其学近吴康斋’，陆公以为狷介之士，殆确论欤！”《闽中理学渊源考》陈真晟学派下《备考》引刘宗周语释“主一”：“刘氏曰：一者，诚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独之说，诚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识慎独义，故以‘主一’二字代之，此老学有本领，故立言谛当如此。”同书本传：（陈真晟）“不复以科举为事务，为圣贤践履之学。初读《中庸》，做存养省察工夫，觉无统绪。继读《大学》，始知为学次第。又读《大学或问》，见朱子博采主敬诸说以补小学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学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为敬，则见程子以‘主一’释‘敬’，以‘无适’释‘主一’，始于‘敬’字见得亲切，乃实下工夫，推寻此心之动静，而务主于一，静而主于一，则静有所养，而妄念不作矣，动而主于一，则动有所持，而外诱不夺矣。尝语人曰：‘《大学》诚意章为铁门关难过，“主一”二字乃其玉钥匙也。’盖意有善恶，若发于善而一以守之，则所谓恶者退而听命矣。又曰：‘人于此学若真知之，则行在其中矣。’……天顺三年，用伊川故事，诣阙上《程朱正学纂要》。其书首采程氏学制，次采朱子论说补正学工夫，次作二图：一著圣人心与天同运，次著学者心法天之运次。”^②对于陈真晟的学术思想，同治刊本《福建通志》陈真晟本传解释其所画二图：“其一为天地圣人之图，大书一心字，中虚曰敬，左曰静右曰动，以黑白象阴阳动静而分乾、坤、坎、离，总为之说曰：‘右图二。一著天心动静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当。然是性之复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静以体之，以尽其法天之

^① 何乔远《闽书》卷三十七，第932页。

^②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十一。

功效也，而有序焉。盖始则主敬，使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即致知诚意之事，是始学之要也；终则敬立而动静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诚意”之事，是圣贤之成也。敬之功用如是，岂不大哉？三代学校所以教者，惟此而已。程、张、朱氏出，此学大明，及朱氏没而复晦者，因宋元学校虽用程朱之书而取士则仍隋唐科举，视心学为无用，故多不求，遂失其真传焉。今幸圣明崇重学校，蔡、程、朱之议而用之，则心学之传可继朱氏。夫象理甚明，不烦辞解，但能体此下学之功，循循然以得上达之妙，虽四书五经无复遗理矣。^①……真晟学无师承，独得于遗经之中。自以僻处海滨，出而访求当世学者，虽未与弼相证，要其学颇似之。”^②天顺三年（1459），陈真晟所著的《程朱正学纂要》中已经有“心学”二图，强调以主静“法天之功效”，明确提出“心学”概念，隐然有后来白沙江门之学、阳明姚江之学的宗旨，在学术上的突破较之陈献章、王守仁均早多年。前贤已在陈真晟归属心学还是传统程朱理学之间持论未定，之所以如此，陈真晟的学术思想必有以与传统程朱理学相异者，但又未完全脱离程朱理学的基本范畴，因此著论未定，大部分学者以为近于程朱，仍在程朱理学樊篱之内。同时学者有林卓立（字华山）、林雍（字万容，号蒙庵）、李文举、张日钦、王伯玉、沈文炳、周瑛等，从陈真晟讲学。光绪《漳州府志》林雍本传称：“布衣之学，雍契之独深。”^③陈真晟生于镇海卫，迁龙岩，晚居漳州玉洲，游处范围较广，影响到其学术思想的传播范围。

陈真晟的学术具有一定的特立独行之处，何乔远在《名山藏列传》中称：“陈真晟而下，皆不立门户，不开讲堂，卓然圣人之道，躬修君子也。蔡清身自力学，而教人恒循举业以入，曰：‘不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罗钦顺无一毫越轶圣门宗旨，视王守仁尤笃也。”^④这是何乔远面对王守仁之后学术流派门户壁立，酿成党争的晚明政治、学术众生相而发出的感慨。

福建理学变异主要发生于兴化府，莆田县的周瑛、陈茂烈等是福建较早的曾经向陈献章学习过的士大夫，续起的、追随心学的学者又以兴化府最多。民国《莆田县志·理学传序》云：“逮宋兴而周、邵、程、张诸大儒始为穷理尽性之学，续洙、泗不传之绪，六经之道始大明于世。自是道脉一贯，授受咸渊源，衍为朱、陆二派，朱主敬而陆主静，明清之世，二派异同相攻，以至于衰熄。莆之学派，方氏道辅（方元寀）亲受于程伊川，林氏谦之（林光朝）

^① 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二百十二，影印第3904—3905页。

^② 沈定均《漳州府志》卷三十，影印第627页。

^③ 何乔远《名山藏列传》，《明代传记丛刊》第77册，第661页。

则传自陆子正，玉湖陈丞相（陈俊卿）延朱子讲学，其三子守、定、宓皆从朱子游，朱子去，其门人犹立仰止堂讲约，至元世始绝。明白沙陈氏以虚静为宗，已开姚江之先，而陈氏时周从之游。清张清恪（张伯行）开府闽中，立鳌峰书院，复伊洛之学，而郑氏慕斯（郑文炳）承其绪，皆朱、陆之支派也。夫道源于天，或由博以致精，或由定以致静，其归则一，可相成而不相非。”^①

在陈献章（1428—1500）创立江门白沙学派之初，闽中学者便得风气之先而师陈献章，但福建地方史志均讳言这段历史，或存麟爪半言，语焉不详。今莆田市荔城区保存有“俞氏世家”立石，题陈献章书^②。查民国《莆田县志·选举志》，当陈献章之世，莆田俞钊于成化十年甲午（1474）举人中式，其子俞应辰系弘治十四年辛酉（1501）举人、正德九年甲戌（1514）进士，则大致可以认定这是陈献章为俞钊题石，也可以知道陈献章和俞氏家族成员的交往。

以兴化府而言，有周瑛、陈茂烈、林典、丘天祐等学者，民国《莆田县志·理学传》均有传。张岳所撰《镇海卫乡贤祠记》认为：“景泰、天顺间，布衣陈公、翠渠周公二先生同时产于镇海，皆以学行有闻于天下……初设塈时，调二郡之人戍守者，二先生盖守者子孙云。”^③二郡指的是陈剩夫祖先的籍贯地泉州府和周瑛祖先的籍贯地兴化府，陈剩夫、周瑛都和陈献章有着较深的渊源。

周瑛（1430—1518），字梁石，号翠渠，又号蒙中子。事迹具见《翠渠摘稿》之《自撰蒙中子圹志》。林俊《明进善大夫四川右布政使致仕例进一阶翠渠周公墓志铭》：“公生镇海，长于莆。”^④周瑛父周举，叔父周从，弟周环、周项。正统八年（1443），周瑛徙莆田。成化七年（1471），周瑛出知广德州，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十一有诗《送周梁石知广德州》。《明史·周瑛传》：“瑛始与陈献章友，献章之学主于静。瑛不然之，谓学当以居敬为主，敬则心存，然后可以穷理。自六经之奥，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穷。积累既多，则能通贯，而于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谓求诸万殊而后一本可得

① 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卷二十九，影印第542—543页。

② 莆田新闻网2007年12月27日，网址 http://www.ptxw.com/wenti/xhws/200712/27/7494_0.shtml。文字、照片来源于《湄洲日报》。

③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十一，《布衣陈剩夫先生真晟学派·备考》。按：此文不见于四库本《小山类稿》。

④ 林俊《见素集》卷十九。

也。”^①《四库全书总目·〈翠渠摘稿〉提要》：“张诩作陈献章行状，称瑛为献章门人，而（周瑛八世孙）成跋力辨其非。是以二人之集考之，盖始合而终睽者。诩与成之说，皆各执其一偏。”^②周瑛有《咏古送陈白沙归南海》：“东都事矫激，西晋尚清虚。一时意自适，社稷随丘墟。譬彼门户开，转运由其枢。大势一倾倒，力救将何如？君子阅世多，立说慎其初。择中而守固，孔氏有遗书。”^③

民国《莆田县志》周瑛传：“周瑛，字梁石。领景泰癸酉（四年，1453）乡荐，屡上春官不第，乃益泛滥群籍，务钩深探颐，与白沙陈献章、辽左贺钦上下其议论。成化己丑（五年，1469）第进士，知广德州……瑛丰神曜古，其学不专与赅博。尝作《李氏义学记》曰：人心无外，以为有外者非也。圣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动有以行天下之达道，由体及用，一以贯之，故始学之要在收放心，收放心在居敬，居敬则心存聪明睿智，皆由此出，然后可以穷理。所谓穷理者，非静守此心而理自见也，盖亦推之以极其至焉耳。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此言人心无外也。不即物以穷理，其能尽此心之体乎？故自性情食息之微以及天地万物之广皆不可不求其理。积累既多，自然融会贯通而于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学者所易言，然《中庸》有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又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此譬如谷种，虽自块然而根苗花实皆具于此，又如鸡卵，虽自浑然而羽毛嘴距皆具于此，及其发见于事，在圣贤体用一贯，在学者未免差互，盖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发不无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摇夺，故所施不无迁就之异，然而既见本源，则于处善亦安，循理亦乐，至于患难事变，虽以死易生，亦甘心为之，此圣学之大略也。”^④据此传，周瑛与陈献章的交往在其未举进士之前，即成化五年己丑（1469）之前。陈献章在成化二年（1466）复游太学，为祭酒邢让所重，名动京师，周瑛与陈献章的交往当在此年前后。按：《明儒学案·方伯周翠渠先生瑛》：“先生以居敬穷理为鹄，白沙之学有所不契。寓书李大厓以辩之”云云^⑤，传文中《李氏义学记》即黄宗羲所称之书，《明儒言行录》作《题嘉鱼李氏义学记》，载《翠渠摘稿》卷四。李大厓即李承箕，字世卿。原文有“二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二，第24册，第7253页。按：本传作卒年八十七岁，误。据林俊所撰墓志铭，周瑛享年八十九岁。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第1493页。

^③ 郭柏苍《全闽明诗传》卷十，《全闽诗录》本第364页。

^④ 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二）卷二十九，影印第556页。

^⑤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六，《明代传记丛刊》第002册，第1096页。

十年前”字样，可知此书作于周瑛和陈献章均进入暮年之时，虽诸书称周瑛与陈献章有所不契，《明儒言行录》甚至称周瑛一守朱子之学，但是此书讨论静动、心之内外都是有本于陈献章的学说，只能说明五六十岁时的周瑛思想开始渐趋保守，因此周瑛的学术思想中必有白沙之学的影响。光绪《漳州府志》周瑛本传记载了一条他书未见的材料：“瑛未第时，受学于陈真晟，尊响而笃信之。及举进士，与陈白沙献章、同郡林雍相往来，见《朱子语类》，抄读之，奉书真晟云：‘从此用功，当有见处。’真晟与反覆议论，多所开发。”^①周瑛笃信其师陈真晟的思想，陈真晟的思想原本接近于陈献章的白沙之学。

同时学者黄仲昭和陈献章也有着深入的交往。民国《莆田县志》黄仲昭本传：“仲昭气岸屹立，好古自信。尝与白沙陈献章往来议论，凡圣贤一言一行，务求践履之实。平生著述羽翼程朱，若辨《易》卦《未济》，《春秋》褒贬，《雅》、《风》升降，及编次《或问》，裁定《通鉴》，证异书法，咸有发明。又刊布冠、婚、丧、祭之仪以示后学，儒雅蕴藉，粹然一出于正矣。”^②周瑛和黄仲昭尽管和陈献章交游，但二人与陈献章之学并未尽合，周、黄同邑士人、学者陈茂烈师从陈献章，较多地接受了陈献章的学术思想。

陈茂烈(1459—1517)，字时周。弘治九年丙辰(1496)进士。陈茂烈登进士第后奉使广东，师陈献章。传见《闽书》等书。民国《莆田县志》陈茂烈传：“时周瑛、黄仲昭二人皆以理学倡，然皆与白沙交游，议论未尽合。至是，茂烈奉使广东，独师白沙。白沙与之语累日，且告以为学须静一，退而作《静思录》。其自叙略曰：‘水动则波，波则涵；正则澄，澄则照。故波虽不与涵期而涵自至，澄虽不与照期而照自至。动静之分也，观水可以见心矣，是以贵静思也。孔门颜、曾之后若周濂溪氏志虑高洁，默契道体，亦以思为圣功之本。’又云：‘静则虚，虚则明，明则通，嗣是伊、洛、关、闽动静夹持，内外交养，咸恪守此道，士欲希圣贤而寻向上去，可不就这里做工夫耶？’……同时传白沙之学者有林典、邱天祐。”^③陈茂烈壮岁致仕，归家养母，不再出仕，其孝行彰，而其学术影响仅限于兴化府及其周边区域。《闽中理学渊源考》立《恭清陈时周先生茂烈》学派并有李清馥按语：“白沙之学，明代诸公共议之，谓其近于禅学，然其高风素节，亦可追已。时周先生师事白沙，其省身克

^① 沈定均《漳州府志》卷三十，影印第627页。

^② 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二)卷二十九，影印第557页。

^③ 石有纪、张琴《莆田县志》(二)卷二十九，影印第557—558、559页。

己之录，未知与师门宗旨如何。考之林公见素志公墓曰：‘隐衷粹行，对天地而质鬼神，其人品在黄宪、管宁之右。’当时莆中诸公推许，亦无异词，其操履可想矣。”《恭清陈时周先生茂烈》传文对于陈茂烈所接受的陈献章思想记载较多：“是时，新会陈献章以理学倡东南，茂烈则往执弟子礼，语累日。献章甚喜，告以学须静一，于是退作《静思录》，佩其言终身……日坐斗室，究极五经、《四书》之旨，以身体验，随得随录。尝曰：‘儒有向上工夫，诗文特土苴耳。’尝与友人论学书曰：‘承示胡敬斋书，日不释手，议论精切，用心良苦，假所修如之，当于吾道中求之也，恨生晚而未考其世焉。至于论白沙、一峰二先生，与邱文庄（濬）、张东白（元祯）颇有抑扬，一时之言，而非棺之论也。文庄二公，吾不及知，一峰之志节尚矣。白沙之学而疑其禅，非真知白沙者也。人一心也，其用一耳。士以记诵辞章竞科名，日趋于下矣……白沙之初见康斋而归也，闭户穷尽古今典籍，又筑台静坐，不出阈外者数年，深潜静思，真积力久，心悟理融，而自得之妙非人所能知也。……窃尝细玩尊德性、道问学一章，学圣贤之法备矣。然人之气禀不一，清者知之胜，淳者行之胜，无偏废焉，所入异而所造一矣。安得起敬斋于九原，相与细详？’又曰：‘万物备于我，反而求之于心身，无限欠缺，无限病痛，至于中之欺慊冷暖自知，若夫愧影、愧衾、严切之功无逾于此，烈虽鄙薄，每自检点，勉循规矩，今事至教，先以治病为急，若病去药除，则终身之训也。’其持论如此。”^①林俊所撰墓志，即《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监察御史梅峰陈先生墓志铭》，见《见素文集》卷十八。据林俊所撰墓志铭，陈茂烈卒于正德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十六日，年五十八。

陈茂烈曾经编辑有朝廷疏荐陈献章的名臣彭韶的文集，与吴原之子吴梦麒、邑人陈晦交好。《闽书》陈晦本传：“（陈晦）累官江西参政，以忤中官刘瑾致仕。与林俊、陈茂烈、张元绅友善。文章、政事推重一时。”^②陈晦系陈纯之子，与陈仁友善。林俊在正德年间故与王守仁狱中相知，陈茂烈又师从陈献章，白沙、姚江之学的学术思想接近，故以此推测，陈仁、陈晦皆可能接触了王学或白沙之学。陈茂烈的门人有泉州府惠安人郭克一（字约之），《闽书》郭克一传称其“少从陈茂烈学”^③，陈茂烈“语（郭克一）以为学当涵

^①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十四。

^② 何乔远《闽书》卷一百十一，第3334页。

^③ 何乔远《闽书》卷八十九，第2677页。